

# 有些事明星要学会“不公开”



纵然现实“允许”公众对明星婚变指手画脚,但要始终记得他们依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无论在婚姻生活中做了怎样的事,他们也都有权免受来自他人的言语暴力。这样约束对公众是有效的,对明星自己亦然,最好也别以“自曝家丑”的方式,借有“豁免权”的公众之手,挥舞着道德大棒“快意恩仇”。

王宝强遭遇婚变,对外宣称妻子与经纪人发生“婚外不正当关系”。这条午夜发出的消息,迅速吸引了舆论的眼球。连奥运赛场上的摘金夺银都显得暗淡无光了。与以往类似事件不同,这则消息并非来自“狗仔”,而是王宝强主动发布的,这也算是“别开生面”了。

明明是夫妻间私事,瞬间成了接受公众审视的公共话题,有分析文章就此为“宝宝”点赞,理由是王宝强主动出击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把舆论的风向成功地引向了对妻子的批判。或许对于王宝强来说,挑动舆论指责妻子很解恨,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互扒隐私掀起高潮,网络暴力蜂拥而至,低俗炒作借机发威,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成为赢家。

从发布的时间以及措辞来看,王宝强发布的那则声明应该是“深思熟虑”过的,将一个忠

男人的形象与一个出轨女人的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于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游街一般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那些看到封建社会对通奸者施以酷刑便大呼野蛮残忍的人,此刻却毫不吝惜地对“出轨者”恶语相向。如果说声明的本意就是呼唤社会舆论为其“主持公道”,那这个目的肯定是达到了,其深知仍有很多人愿意对他人的情感纠葛施以道德审判。

给“出轨者”一通大棒确实解气,可除了提供坊间谈资之外,对谁又有真正的好处呢?被扔了一身“臭鸡蛋”的当事人自不必说,随着曝光隐私的步步深入,王宝强也未必好过。在流传很广的几篇网文中,这个饰演过诸多憨厚耿直甚至带点傻气的角色的演员,渐渐地被剖析出自卑怯懦且不理解究竟该如何处理感情的悲剧性格。当然更可悲的是,他那个在真人秀中颇受欢迎

的一双儿女,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这场风波所制造的伤害。这些后果显然是可以预料到的。

或许正是出于保护各方情感的考虑,我国现行的法律,包括民法通则、婚姻法、侵权责任法等,对夫妻感情纠纷处理有一定的约束,除用于诉讼目的之外,公开散播“对方出轨”属于涉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这样的法律规范更多把夫妻感情视作仅限于两个人的事情,客观上有助于抑制那种对他人私事施以道德审判的冲动。与此同时,“通奸”等罪名早已被现行法律所摒弃,所谓的“婚外情”也仅仅在离婚财产分割等方面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从中不难看出法律对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引导。

其实在以往有关明星情变的事件中,由于绝大多数最初来自娱记或网友的披露,彼时就引发过有关明星隐私权的争论。应该形成共识的是,明星的生活尤

其情感变故,如果一公开就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不公开也不会使公共利益受损,那就属于法律所保护的隐私权的范畴。只不过在现实语境之下,由于一些明星会对“披露隐私”加以利用,即便隐私真的受到侵犯也少有人诉诸法律,于是,依据公众的思维定势,明星的私事也就成了可以任意置评的“公事”。

换句话说,“是不是这样”与“应不应该这样”并不是一回事,纵然现实“允许”公众对明星婚变指手画脚,但要始终记得他们依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无论在婚姻生活中做了怎样的事,他们也都有权免受来自他人的言语暴力。这样约束对公众是有效的,对明星自己亦然,就算是做不了孔令辉和马苏那样的“中国好前任”,最好也别以“自曝家丑”的方式,借有“豁免权”的公众之手,挥舞着道德大棒“快意恩仇”。

## 处处设“路障”,网约车如何“起步”

### 试说新语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地”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近日,山东省召开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电视会议,专门对该项工作做出部署。会议特别要求济南、青岛两市“加快”制定相关实施细则草案。

作为在全省具有特殊地位的两座城市,济南、青岛在全省网约车“落地”工作中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希望它们在这方面的探索能为全省工作积累经验、提供示范。对两市而言,这既是一抹荣光,又是一副重担。

从既有报道看,相比于青岛,济南行动得似乎更早一些。不过,从这些准备性的“动作”中,网约车的拥护者们隐约嗅到了某种异样的气息。日前,济南市客管中心和济南市出租汽车协会联合下发的《深化出租汽车改革热点问题11问答》(以

下简称《问答》),据说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信息:网约车车辆档次应明显高于当地主流巡游出租汽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网约车与巡游车有不同的标识,不能“扫马路”和站点候客、只能通过预约方式提供服务。

这种特别耐人寻味的“问答”,极易让人联想到7月28日深夜济南市客管中心发给出租司机的那条“安抚短信”,在这条轰动全国的短信中,客管中心第一时间向出租司机表达了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心。对上述几条信息稍作分析就会看到,《问答》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信心的某种延续。鉴于相关信息的语焉不详,对网约车采取迥然不同的定价方式并对其活动区域进行严格限制的依据何在姑且不论,仅从如下两个方面就足以看到这些“准备动作”的潜在杀伤力。

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济南现有的出租车绝大多数是10万元以下的A级车,网约车车辆档次被设定为“应明显

高于当地主流巡游出租汽车”,这意味着网约车必须在B级以上。而济南现有活跃的大约五六千网约车司机,80%开的是A级车。如果再考虑到办证对其中有些人的阻拦,几乎让济南网约车全军覆没。

另外,就不给网约车扣上一顶“大帽子”,如果真喷上“显著标识”,对相当一部分潜在的网约车司机而言也是具有毁灭性的一招。网约车司机来自各行各业,很多人开网约车只不过是利用碎片化的空闲时间,盘活一下闲置资源,增加一点收入。他们更愿意在不引人注目、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工作。如果非要在车上喷什么“显著标识”,很多人就会不干网约车了。

对一种刚刚获得合法性的新生事物,轻易祭出这样的“杀招”,不仅失之公允,而且有失明智。因为,这些“杀招”不仅有违常识,而且,在本质上是与趋势为敌。

不论是巡游车,还是网约车,其实本质上都是为顾客提供出行服务的广义上的出租

车,只不过网约车更早更充分地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罢了。在绝大部分出租车都是A级车的情况下,为什么网约车就非得要是B级以上?巡游车标识越明显越易于招揽顾客,而信息技术已帮助网约车司机与顾客实现了精准对接,为什么还要喷“显著标识”呢?在市场经济浩浩荡荡的今天,在一些早已不那么需要“看得见的手”的领域,为什么还有人这么热衷于管制?在分享经济每年以40%的速度蓬勃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这样逆趋势而动?这样有违常识的逻辑令人费解。

好在至少到目前为止,诸如此类的担忧尚属“瞎操心”。毕竟,拟议中的“草案”尚在起草阶段,而且,《问答》之类的“准备动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草案”以及最后的实施细则构成影响亦未可知。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盼望:网约车“落地”千万不要搞成一场有明显针对性的阻击战,甚至歼灭战。

### 媒体视点

#### 列车停电不能停服务

12日,由北京开往深圳的G79次高铁列车发生停电故障,上千人被闷在40℃高温的车厢内近2小时,旅客们大汗淋漓,有的热得“差点虚脱”。一张母亲抱着头发湿透的孩子的现场照片,看了尤其让人心酸。尽管铁路方面当天向旅客致歉,但面对应急服务滞后的现实,铁路方面应该多想破解之策。

事实上,类似事件已不止一次发生。今年2月,北京开往宜昌的G555次高铁在河北两次停车,因车厢闷热,有旅客昏厥。去年8月,福州开往上海的G1634次高铁发生故障,中途暂停近1个小时。2011年7月,一起供电中断事故导致多辆列车中途停车、断电断水没空调。

近年来,高铁已经成为人们远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也是我国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虽然停电故障事出有因,也是小概率正常事故,且不能开门通风也是为确保安全,但铁路方面对屡有发生的同类事故,不改善应急服务工作,就不能合理解释了。

安全舒适,是铁路客运的基本要求。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铁路方面既要坚持安全第一,也要保障旅客舒适。事实上,列车中途停车的应急预案不是没有,从一些地方铁路局、段公布的实施细则看,应急预案内容还相当完备。多起类似事故中,旅客均反映喝不上水、透不了气、找不到乘务员,这些都提醒铁路方面应该在应急预案落实上多下工夫。

高铁一遇断电车厢就成“闷罐”的问题,并非没有破解之策。比如,是否可以加大应急备用电源功率支持车厢照明和空调,车厢是否可以设计出用于应急通风的天窗,临近车站是否可以提供应急补给等等。铁路方面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建议,组织专家去做评估,对可行的,要从善如流,尽早改进。

从京津城际铁路在2008年开通算起,不到十年时间,我国的高铁事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不易。着眼取得更大成就,铁路方面不仅要建好“硬件”,也应多考虑服务等“软件”,把服务保障搞上去。(据新华社8月14日电,作者刘怀丕、段续)

## 以养老保险“扩容”应对“抚养比”下降

### 一家之言

谭浩俊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报告显示,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继续下降,由2014年2.97:1降至2.87:1。也就是说,不到三个人要“养”一个人,意味着年轻人养老压力正持续增大。

如果说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收支矛盾增多、增收难度扩大等都是目前养老保险工作中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的话,那么,养老保险抚养比下降,则是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症结。如果不是抚养比持续下

降,问题至少不会这么严重。

抚养比的下降,在职工人数基本稳定、就业人数还在增加的情况下出现,就意味着退休人员的增加速度更快,对养老金的需求更多。抚养比下降自然与人口老龄化分不开,而从目前养老保险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没有有效扩大,游离于养老保险之外的人员仍然较多,也是养老保险抚养比下降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员,未能纳入到养老保险费的缴纳范畴,一些企业为了少缴保险费,就把不缴纳养老保险等与员工的薪酬挂起钩来;另一方面,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一部分“买断工龄”、

“买断身份”者,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再将养老保险续上,从而“流失”了一部分参保人员。

正是因为该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员没有纳入到养老保险缴纳范围,从而使养老保险缴纳人数无法有效反映养老保险工作的正常情况,影响了养老保险抚养比的稳定。如果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能够进一步扩大,直至扩大到所有人员,那么,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就不会这么快,对养老保险费的收支压力也会小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年养老保险工作的实际来看,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地方政府,都更多把提高养老保险收费标准当作缓解养老保险费收支矛盾、防止养老保险基金产生缺

口的主要手段,而忽视了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纵然重视,也多是在文件上、会议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步伐在不断加快,且远没有进入拐点。因此,如果不在覆盖范围上下工夫,那么,抚养比还会进一步下降,由此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而养老缴费标准过高的问题,又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所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是缓解养老保险收支矛盾、减轻政府压力的重要措施。

投稿信箱: qilupingjun@sina.com